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

[資料彙編]

羅常培 蔡美彪 合編

科學出版社

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

〔資料彙編〕

羅常培 蔡美彪 合編

科學出版社

1959

內 容 簡 介

八思巴字是元代蒙古族所用的一種文字。編者整理了陸續搜集的八思巴字對譯漢音的資料，並對這些資料作了考訂和說明。本書敘述了古代蒙古字的發展史，八思巴字的創製經過和推行、使用狀況，有助於蒙古史和漢語史的研究，也可供民族工作者參考。

八 思 巴 字 與 元 代 漢 語

〔資料彙編〕

羅常培 蔡美彪 合編

*

科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號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1959 年 11 月第 一 版

195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京) 道：1—1,000

報：1—800

書號：1957

字數：77,000

開本：787×1092 1/18

印張：6 2/9 插頁：28

定價：道林本 2.70 元
報紙本 2.30 元

前 言

八思巴字是元朝八思巴喇嘛仿照西藏字體所造的一種蒙古字。當創造這種字的時候，蒙古的統治者本想拿它替代在這以前用來書寫蒙語的古畏兀字，但是從至元六年（1269）頒行以後，直到元朝滅亡，它只是用在當時的官方文書或官方造發的各種東西上，始終沒能徹底地普遍地推行。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現在不單還保存着很多用八思巴字寫蒙語的資料，而且元代歷朝八思巴字對譯漢語的資料也保存得非常豐富。這些對於研究蒙古史，古蒙語和漢語史都是很有用處的。應用八思巴字對譯漢語的資料可以研究元代漢語的音韻系統，並可以從而推求它和漢語普通話在發展過程上的關係。

本書是一部八思巴字對譯漢語資料的彙編。前面的緒論只是綜合一些材料並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對八思巴字的創製推行概況作一簡略的說明，是供一般讀者參考的。現存八思巴字文物，我們沒有全部收入，也在緒論中作一概括的介紹。作為本書主體的，自然是第二部分的資料。我們對這些資料曾作過一些簡單的說明和考訂，也附在這裏供參考。無論是緒論或資料說明，都是幾年前的舊稿，一九五二年就已排印付型了。現在看來，有些地方已不能滿意，但一時亦難於作較大的修改。好在這都只是參考性質，不當之處，尚希讀者指正。

我們本來打算依據這些資料，校訂蒙古字韻一書並和韻會舉要相互對比，作一些語言學上的研究。拖了幾年，一直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以償。現在，我們把這些已收集到的不完備的資料整理編印出來，供歷史語言學者大家利用。我們相信，這樣作會更便於促進這一工作的展開。

以前,國內外學者對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的研究曾作過一些工作。但比較系統的研究,當推蘇聯語言學家龍果夫教授(A. A. Драгунов)的論文‘八思巴字與古漢語’。這篇論文發表於1930年。作者雖然沒有看到像現在這樣多的資料,他的結論也還有許多需要修訂補充的地方,但他當時的工作爲後來的研究開闢了道路。我們曾請唐虞同志把這篇論文翻譯出來,將由科學出版社與此資料彙編並行出版,以供研究八思巴字的音讀和音韻學上一些問題的人們參考。

編 者

一九五八年五月

目 錄

前 言	I-II
壹、緒 論	1-30
一、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	1
二、八思巴蒙古字的創製及推行	8
三、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文物	16
貳、資 料	31-127
一、碑刻	32
北京大學所藏八思巴字碑拓簡目	32
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	39
二、事林廣記百家姓	41
元至元鄭氏刊本事林廣記百家姓跋	41
元順帝至元六年刊本事林廣記蒙古字百家姓	57
日本元祿十二年刊本事林廣記蒙古字百家姓	69
三、蒙古字韻	83
蒙古字韻跋	83
關於蒙古字韻	87
寫本蒙古字韻	93

插圖及圖版目錄

插圖一	北元‘太尉之印’	19
插圖二	八思巴蒙古字篆字‘隆鎮衛百戶之印’	20
插圖三	元代花押	21
插圖四	元國書牌	23
插圖五	大元通寶錢和至元通寶錢	26
圖版一	‘至元通行寶鈔’殘鈔	24—25 之間
圖版二	至元寶鈔鈔版拓本	24—25 之間
圖版三	至治元年和大德四年大都路銅權拓本	30—31 之間
圖版四至三十	八思巴蒙古字碑刻拓本	40—41 之間
圖版三十一、三十二	蒙古字韻書影	94—95 之間

壹、緒論

一、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文字

古代蒙古人的記事方法——塔塔統阿的以畏兀字寫蒙語——印章制度的傳入與授字的關係——八思巴以前蒙古人所用的各種文字——八思巴造字的因素

古代的蒙古民族本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最初,也和古代的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用刻木結草等方法記事。當時去過蒙古的幾個漢人,都曾提到過這件事。趙珙蒙韃備錄:¹⁾

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說郭本作止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上:²⁾

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

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³⁾

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

沒有去過蒙古的宋人,也有談到這事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

1) 趙珙蒙韃備錄(王國維箋證蒙古史料四種本)頁三上。案原書題孟珙撰,今據王國維考證改過。

2) 長春真人西遊記上(王國維校註蒙古史料四種本)頁二十二下。

3) 彭大雅徐霆黑韃事略(王國維箋證蒙古史料四種本)頁九下至十七。

‘韃靼’亦無文字；每調發兵馬，即結草爲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爲契，上刻數畫，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爲驗。

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滅乃蠻 (Naiman) 後，擒獲太斡汗傳塔塔統阿 (Tatatunga)，曾叫他教太子諸王以畏兀 (古代的維吾爾) 字寫蒙語。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

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大斡可汗尊之爲傅，掌其金印及錢穀。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俄就擒。帝詰之曰：大斡人民疆土悉歸於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爲信驗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蘊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

關於古代畏兀字與敘利亞文的關係及其創製、流變諸問題，這裏暫不詳論⁴⁾。上引的這段史料裏，須要特別指出的是：塔塔統阿所教的是‘書國言’（蒙語）的‘畏兀字’。這種蒙古畏兀字的遺物，現在仍存有很多。其中要以蘇聯列寧格勒亞州博物院所藏的一二二〇年至一二二五年頃的所謂‘成吉思汗石’爲最古。法國巴黎國檔庫所保存的一二八九年波斯阿魯渾汗同一三〇五年完者都汗給法國國王 Philippe le Bel的兩封信也都是用這種蒙古畏兀字寫的⁵⁾。聶伯河 (P. Днепр) 畔出土有畏兀字的蒙古銀牌。近世更時常發現這種文字的

4) 可參考 J. Von Klaproth: *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Berlin, 1812;

P.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 Major*, 卷二 1925.

5) Roland Bonaparte: *Documents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Paris. 1895. 圖版十四有此二信圖影。

碑刻⁶⁾，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也收藏有此類蒙古畏兀字碑拓多種。從現存的文物和文獻的研究塔塔統阿對蒙古人的主要功績，無疑的是在於能應用畏兀字來拼寫蒙古語言，創造了當時迫切需要的文字。雖然蒙古語中的若干語音在那時還不能完全譯寫清楚，但在那個時代，對蒙古民族說來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而且，它的優點確還是多於缺點在不斷的發展與改革之後終於流傳下來，直到今日。塔塔統阿所教授蒙古皇子諸王‘書國言’的畏兀字，也就成為今天仍在使用着的蒙文的起源。但近世邵遠平作元史類編，柯紹忞作新元史塔塔統阿傳⁷⁾，竟自忽略了這一點，而把元史原文裏的‘國言’二字刪去，改成‘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此據邵書，柯書作教諸皇子，更誤）。這便與原來的史實及其重要的意義都不相合了⁸⁾。

再有需要附帶說明的是：塔塔統阿與造字有關的另一貢獻，就是給蒙古人介紹來印章的制度。成吉思汗所用的印璽，現在雖已不存，但想必也是用的古畏兀字。彭大雅黑韃事略在記載蒙人使用‘回回字’後，接着寫道⁹⁾：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無封押以爲之防，事無巨細須‘僞會’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徐霆在疏證裏說：

6) 參看格魯賽 (René Grousset) 蒙古史略 (馮承鈞譯本) 一卷六節及三卷六節。

7) 柯紹忞 新元史 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遂命教諸皇子以畏兀兒字書’。

8) 元史類編 塔塔統阿傳，Abel Rémusat曾有譯文，多桑 蒙古史 第一卷沿襲其誤，類編此誤曾由伯希和 (P. Pelliot) 在‘土耳其斯坦’評註中指正。(T. P. 1930)。又李德啓著‘滿洲文字之起源及其演變’ (見前北平圖書館館刊 五卷六期) 引據新元史塔塔統阿傳，未加辯證，殆亦爲其所誤。

9) 黑韃事略 (前引書) 頁十。

靈嘗考之：祇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祇‘韃’主自斷，又卻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

可見直到蒙古窩闊台汗(Ogödüi)(太宗)的時代，這種印璽還只是由耶律楚材和田鎮海分別掌管，用來處理漢人和‘色目’的軍事以外的一些事情。蒙古皇帝自己還不能看當時的文書，因而曾產生一些流弊。成吉思之命塔塔統阿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寫蒙語，恐與此不無關係。塔塔統阿傳中‘始用印章’和‘教太子諸王’兩者記事的先後，也頗可玩味。‘宣命之寶’的印，現在不能見到，無法詳知。當時耶律楚材所掌者也可能是用漢字，鎮海所掌者則必是古畏兀字無疑。蒙古太宗下一代的皇帝定宗貴由(Güyük)曾寫給羅馬教皇 Innocent IV 一封信，這信上所蓋的印就正是寫蒙語的古畏兀字¹⁰，這是我們現存文物中的一個很好的證據，又元史卷五世祖紀二：

中統三年(一二六二)……三月，壬午始以畏吾字書給驛璽書。

這是在八思巴字頒行的五年多以前，元人仍然在使用着畏兀字的印璽。

另外，在塔塔統阿‘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之後八思巴字頒行以前的這一段時間內，有人曾籠統的認為只有畏兀字，且已被普遍應用，故八思巴字不能流傳後世。但假如我們根據史料，詳加探究，則事實並不盡如此。

長春真人丘處機的西遊記裏，記當時仍有刻木之俗，已如上述，而當他和成吉思談話時，雖然有譯者作翻譯，但成吉思的左右仍以漢字記之。據前人考證，這種以漢字紀錄的談話，至少有兩次¹¹。又蒙韃備錄裏說：

10) 見 P.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aris, 1923. 原信附十二頁後，貴由的璽附廿二頁後。

11) 參看伯希和(P. Pelliot): ‘評長春真人西遊記譯文’(原刊1929通報，中譯本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

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說郭本}_{作西}河博易販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文書。於金國往來，却用漢字。

這裏所說的如中國笛譜字的回鶻字當就是畏兀字¹²⁾。當時蒙古統治者橫跨東西，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必須和很多國家，很多不同語言系統並使用不同文字的民族發生交涉。根據上面的這段記載，可知當時的文書，行於西域諸國的用畏兀字，行於東方金國的則用漢字。而這兩種文字，蒙古皇帝是都不認識的（見前）。彭大雅黑韃事略也曾說到這種畏兀字¹³⁾：

其事書之以木杖如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¹⁴⁾，殆兄弟也。

徐霆對這段文字，加以補充說：

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中略，見前）行於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祇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吃。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12) 按‘回鶻’此處即‘畏兀’（Uighur）之異譯。

13) 黑韃事略（前引書）頁九下。

14) ‘回回’一詞，元時或指回族或指‘畏兀’（古維吾爾）族，此處證以上下文及鎮海之出身，當指‘畏兀’無疑。

徐霆隨使蒙古，已在蒙古窩闊台汗（太宗）的七八年間，當時行於漢人的仍用漢字，只行於回回（‘色目’）者才用回回字（畏兀字）。‘燕京市學’的某些投機分子雖然已在教這種字，但蒙古人本族却還在使用‘小木’。可見塔塔統阿所教的，只是‘太子諸王’等蒙古統治階級貴族中的極少數人，一般的蒙古人民則仍然在應用着原來的刻木記事的方法。

又當時蒙古人所謂‘漢人’（札忽惕 Jarqut）¹⁵⁾，實指北方契丹、女真等民族及其所統治下的漢人，而不專指漢民族。因而當時所說的漢字，是否包括契丹、女真民族的文字在內，頗可懷疑。關於此點，我們雖還不能完全肯定，但徐霆所說的‘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則並不可靠。熱河出土的成吉思汗聖旨牌¹⁶⁾，正面寫漢字‘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與蒙韃備錄所記之金牌文字相同¹⁷⁾，但背面所寫的却是契丹文‘走馬’二字。可知當時蒙古人在北方遼金舊地，漢字與契丹字確已同時使用。至於女真字是否也已用過，一時尚無實物可證，但參以蒙韃備錄所說女真降臣教之文書云云的記載，實也不無可能。

據上所述，可知塔塔統阿以後，八思巴以前，蒙古民族並不是統一和普遍地在使用着畏兀字，他們當時所使用的文字是極其複雜紊亂的。蒙古人民自己中間仍然保存着刻木結草的古法，而與其他民族之間則使用着畏兀字、漢字、契丹字，可能還有女真字。這種語言文字上的不統一的現象，在蒙古民族興起初期因為蒙古統治者不能全面掌握，管理文書的人玩弄權柄，便產生了很多流弊。忽必烈進佔漢地，建立元帝國以後，漢族人民成為主要的統治對象，這時除了蒙古人民

15) 參看陳寅恪：‘元代漢人譯名考’（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一號，頁三至六）。

16) 參看張星娘譯，馬哥孛羅遊記（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名著版）。

17) 見蒙韃備錄（前引書）頁十官制條。

與蒙古統治者的矛盾外，廣大的漢族人民與蒙古統治者中間，更存在着極其尖銳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並成爲元代社會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此外，原有的漢人地主階級和新的蒙古統治者間一面互相依附互相勾結，而另一面彼此間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仍然是嚴重的存在着，時隱時現。在這種複雜的新的情況下，蒙古統治者便迫切地要求一種新文字，以便通過這種文字工具更直接地、有效地掌握政權，鞏固地位，以統治蒙漢各族人民。因此，他們所要求的新文字，就不只是要能拼寫蒙語，而還要能拼寫其他民族的語言，首先是漢民族的語言。很顯然，兩種以上的不同系統的語言，在當時如果要用一種文字來同時兼顧，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但在蒙古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之下，八思巴爲他們担負並完成了這一艱巨的任務，創製了拼寫蒙漢等民族語言的所謂八思巴蒙古字，並在政治的壓力下在一定的範圍內行用了。

二、八思巴蒙古字的創製及推行

八思巴蒙古字的創製——頒行時的用意——推行八思巴字的幾項
具體辦法——推行期間的實況

關於八思巴蒙古字的創製，元史釋老傳八思巴傳說：

中統元年（一二六〇），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

又元史卷四世祖紀：

中統元年……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

八思巴是西藏薩迦派佛教的第五祖，十歲時出家，法名慧幢。癸丑（一二五三）年，他十五歲，‘謁世祖於潛邸’。戊午（一二五八）年，蒙古憲宗命釋道訂正化胡經，八思巴與道者駁辯，‘剖析是非’道者辭屈，道教從此一蹶不振。中統元年（一二六〇），被尊爲國師，受命製蒙古新字當是同時或稍後的第一個任務。據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一王磐八思巴行狀：

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爲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朞月，召還。

八思巴在中統元年十二月被尊爲國師並受命製字之後，隨即返藏。此行一方面爲了在政治宗教各方面做一些安排，並建黃金塔；另一方面也可能就已爲造字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如搜集和研究一些佛經中關於字母音韻等的著述，與喇嘛中專研這方面的人做一些討論等等。這一點雖然尙無明白的紀錄（西藏現存史料將來如能利用或可有所發現），但與其不妥當的否認元史釋老傳中統元年受命製字的紀事，倒

不如這樣解釋更爲合理。¹⁾ 若然，則後來八思巴字母之所以由梵藏字母演化而出，也與此不無關係。

新字正式頒行的時代，元史釋老傳說是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元史卷六世祖紀更有詳細的記載說：

至元六年……二月……己丑，詔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

把這條史料與釋老傳互證，其年月當無問題。前引王磐的八思巴行狀把製字、字成、頒行、升號、西歸諸事記在一起，聯於至元七年句下。這年所指的，主要當是西歸或升號（案升號年月不可詳考），並不是在這一年頒行新字。

字成的年代雖然不可確知，但必在至元六年之前的不久。字成之後到正式頒行之前，中間可能還有一段試行的時期。文獻上雖然沒有直接的記載，但可得到實物的證明。據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藏京兆路重陽萬壽宮碑拓本，刊有元世祖忽必烈的聖旨三道，都是用八思巴字寫蒙語，漢字譯意，其中第一道經考訂爲至元五年十二月。此外，雖然還沒有更早的八思巴文史料，但此碑如不是後來補刻，那麼頒行以前，或已有過一些試行的工作了。

到了正式頒行的時候，蒙古皇帝曾特別下了一個詔書。元史釋老傳把它全部錄入：

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

1) 元史卷二百三方技傳阿尼哥傳有中統元年八合斯巴在西藏建塔的紀事，這大概是中統二年的事，因爲元年十二月受命後才返藏，在當年是不能到的。

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²⁾

這個詔書裏特別應該注意的是：‘譯寫一切文字’這句話。有人因受到材料上的限制，曾誤以爲這種字只是古代的蒙文，只用來寫蒙語，僅初期曾譯寫漢語，這種理解顯然是不合事實的。我們現在不單是還保存着八思巴字寫蒙語的很多史料，並且有元一代自世祖忽必烈至順帝帖木爾歷朝譯寫漢語的八思巴字史料，也非常豐富。此外，現存史料中也還有一些是用八思巴字來譯寫梵語藏語等佛教經典的。可見當時八思巴字的應用，確實如頒行詔中所說‘譯寫一切文字’，這只要結合現存史料把這句話細加玩味，便很容易明瞭³⁾。

當時推行這種文字的主要辦法，就是由政府先硬性規定‘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但又恐一時不見得都能認識，所以‘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在詔書頒佈之後，爲了推行這種‘蒙古新字’，先在各路設立蒙古字學。元史卷六世祖紀三：

至元六年……七月，己巳，立諸路蒙古字學。

同書卷七世祖紀四：

至元七年……夏四月壬午，設諸路蒙古字學教授。

另一方面，更具體的規定各種官方文書，必須用這種所謂‘國字’。元史卷七世祖紀四：

至元七年……冬十月，癸酉，敕宗廟祭祀祝文書以國字。

又元典章卷三十一禮部四學校條載有至元八年正月聖旨一通，甚爲

2) 這個詔書元典章卷一詔令條也已載入，但中間有一句略有不同，即：‘因取模楷及虧兀字以達本朝之言’。虧兀‘畏兀’同名異譯，自不待言。此處的‘模楷’曾有人以爲是指以前的‘刻木爲契’，但刻木只可記事並不能‘達本朝之言’，而且我們前節已經證明當時確亦借用過漢字，所以我們覺得傳本典章裏的‘模楷’當是‘漢楷’之誤，仍當以元史爲準。日本羽田亨曾有此說，是。

3) 參看蔡美彪：‘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三號）。